

宝庆讲寺丛书

中国佛教学者文集

朗宇法师

清修法师

主编

# 中国佛教哲学

徐文明 著



教文化出版社

宝庆讲寺丛书

中国佛教学者文集

主编 朗宇法师 清修法师

副主编 圣凯 道坚 黄夏年



# 中国佛教哲学

徐文明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佛教哲学/徐文明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10  
(宝庆讲寺丛书·中国佛教学者文集/朗宇法师、清修法师主编)  
ISBN 978-7-80254-056-9  
I. 中… II. 徐… III. 佛教哲学-中国-文集 IV. B94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147885 号

**中国佛教哲学**

徐文明 著

---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21(编辑部)

策划组稿: 黄夏年

责任编辑: 李 巍

版式设计: 陶 静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5 印张 240 千字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978-7-80254-056-9

定 价: 24.00 元

---

## 总 序

从佛法本身来说，教、理、行、证的修学次第，已经为佛弟子指明了修学的道路。但是，佛弟子因为自己的资质、喜好的不同，往往有所偏向，于是形成不同类型的佛法，有重义理、重实践等区别。但是，作为佛弟子来说，义理的探讨是为了将佛陀所要开示的真实事理，充分、完整地表达出来，如“阿毗达摩”虽然着重于论证“法”的自性、定义、关系等，但是其本意仍然在于“谛理的现观”，最终归于修证。那么，重修证的佛教，主要是从利益众生的角度，重视佛法的适应性、实效性，所以对事相的分别比较少，如初期大乘经典以“般若”、“三昧”、“解脱门”、“陀罗尼”、“菩提心”等作为中心，来表达从发趣、修行到证入的历程。虽然存在着种种不同的侧重，但都是佛法的根本，都是以义理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为中心。中国佛教其实已经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如天台智者大师的教观并重，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高僧传》将古代僧人分为十科，其中翻译、解义、读诵便属于义解门；而习





禅、明律、感通、遗身、护法、兴福，都是属于实践门；最后一科“杂科”则是指出家人的外学修养，旁及世间经书、治世语言、礼乐文章等，无不兼通。

但是，传统意义的佛教义解，主要是注疏经、律、论，在“述而不作”中表达自己的理解与观点，当然也有一些专门性的著作。而且，这些佛教义解僧，都是从自己的信仰与经验出发，通过注疏、论著，来达到实践与弘法的目的。南北朝佛教的兴盛、隋唐佛教的辉煌，都与义解的繁荣是分不开的。而禅宗的发展则为中国佛教注入新的生命，重视主体的体认、自己身心的解脱，净土法门的流行，激发了信仰佛教的感情，为佛教走入社会提供了方便。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禅、净的流行，在这种“简单”、“不立文字”的潮流下，中国佛教徒逐渐失去探讨高深佛理、考察繁琐戒律的兴趣。于是，中国佛教重视义理研究的优良传统便丧失殆尽。

另一方面，佛学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却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应该是开始于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亚洲地区，殖民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必须要深入研究亚洲的宗教及其文化。于是，通过接触梵文、巴利文等东方语言，开始了解佛教的理论，消化佛教的教义。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这些学者注重现代佛学研究的客

观性、纯学术性，形成了佛学研究的现代传统，于是佛教便成为一种学问——佛学。19世纪后期，日本佛教界开始运用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从而推动了日本佛学研究的兴盛与发达。随着“西学东渐”、日本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增强，中国开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这在当时中国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与回应，如《大乘起信论》、《楞严经》的辨伪，“大乘佛教非佛说”的讨论，“佛教非宗教非哲学”之辩等。同时，佛教界受时代流行的学术方法的影响，尤其是以太虚大师为首的“人生佛教”运动，佛教理性主义思想的高扬都直接推动了佛教界从事佛学研究，其中以印顺法师的成就最大。但是，相对来说，学术界则在佛学研究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像吕澂、陈垣、汤用彤等，皆为一代学术大师。

改革开放后，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佛教界基本上完成了修复寺院、重塑佛像的工作，寺院呈现出游人如织、香火旺盛的现象。于是，培养人才、弘法、学术研究等工作提到首要位置。然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各方面人才的紧缺无形中遏制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而人才的成长与培养，这又与佛教界的观念与重视程度是成正比的。

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由于受到欧美治学风





气的影响,文献学、考据学、思想史、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被大量地使用,对佛教进行理性地分析,定性定量,促使人们对佛教认识更加深入。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工具,用来剖析佛教的历史与思想等等领域,扩大了佛教的知识面,更凸显了佛教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积淀。学术研究利用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各种文献的比较研究,不断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资料,显示其优胜之处。通过学术研究,使佛教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发展脉络更加清楚,提高了人们对佛法的正确认识。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学者本身就是社会的精英,对社会了解非常透彻,其思想观点往往能够补充僧界的不足;同时,他们作为佛教界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圆融转化佛教的思想,向社会表达佛教的看法,这些都是有益于社会与众生的活动。

因此,佛教学术研究的根本意义,不仅是了解存在于一定时空中的佛教发展形态,而且更是从现存的文献、文物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探索其前后延续,彼此关联的因果性;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到佛法的本质,及其因时、因地的适应。以了解过去,承受根本的佛法特质,作为我们信行的基础,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代表大会便提出要契理契机地弘扬“人间佛教”思想,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以文化阐扬佛法,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契理契机地以文化阐扬佛法是实现佛教中国化、本土化、现代化的权巧方便。”现代中国佛教界,应该认真地认识学者们的新观点,吸收其中的有用之处,通过转化与变通,仍然能够落实到佛法的信仰与实践,佛教才具有更大的潜力。

宁波宝庆寺始建于北宋端拱二年(989),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嘉定十五年(1222)宋宁宗赐名“宝庆讲寺”。寺里历代住持及僧众均有重视义理、尊重学术、礼待学人的优良传统,一直讲法不辍。曾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性启蒙教材《三字经》的作者王应麟曾为宝庆寺撰写了《宝庆讲寺记》。大儒黄震为寺里撰写了《宝庆寺观音殿记》。此二文的碑刻至今仍然保存完好,高高地耸立在寺里。现在宝庆全寺僧众十分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在日常事务、早晚功课、坐禅念佛等之外,勤于读书,研究经论。我本人自从出家以来,参访名山大寺,受到多位高僧大德善知识的指点,喜欢研读经论及现代学者的研究著作。因此无论到哪里,我都会带上一些书,也经常会到各地的书店去逛逛,看到佛教书籍经过十多年的出版,蔚为大观,感到欣慰。但是,对于社会的需求和佛教文化的发展,目前出版的书籍远远无法满足人们对佛法的需求,而且现有书籍之中,难免良莠不齐,精品佛教图书仍然少见。有







感于此,我和道坚法师、圣凯法师、黄夏年先生进行一些交流,得到他们的赞同与支持。于是,我们决定以本寺的名义出版一套丛书,希望能够推进佛学研究的发展,让佛法能够深入社会人心,达到净化人生的效果。

朗 宇

2004年6月21日于宁波宝庆讲寺

## 自序

不知不觉,来到北师大已经十二年了。十二,一个富有意义的数字,从中国传统的属相来说,恰是一个轮回;自佛教而言,十二因缘也是生命流转的整体过程。

我一向认为自己能力低下,至少是生活能力低下,虽然在学问上可以凭借下苦功来以勤补拙,但谋身乏术却是藏不住的硬伤,因此多年来一直是凄风苦雨,饱受艰辛。我不想怨天尤人,这不是佛教的习惯,只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一则是业习未尽,故当受此报,二则是能力不全面,整体素质偏低。

我的能力低下,尤其表现在找工作方面。硕士毕业时生不逢时,诸缘不顺,故历尽艰辛,颠沛流离。好不容易考上博士,没有想到毕业时还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在一个企业办的研究所存身。直到十二年前,我才有幸来到北师大哲学系工作,从此才真正步入正轨,有了一个在学术上发展的平台。

说来也巧,我的工作地点一直在小西天一带。当年硕士毕业后在一个公关事务所工作,寄住在中国电影乐团。博士毕业后在首钢研究与开发公司工作,还是在这一带。如今在





北师大工作，依然没离开小西天。此生业报深重，解脱何期，西天路遥，成佛无日，但能一直寄身于小西天，已是难得的福报。

十二年一个轮回，当年是凄凄遑遑，小鼠寂寂，虽然招摇过市，却没有人人喊打的热辣，而今已过不惑，虽不敢以硕鼠自居，却也借西天之力，凭师友之福，有头有脸，鼠模鼠样，俨然成了代表北师大混迹于佛学界的一方中鼠。

十二年间，我在北师大既得到很多的鼓励，也受到不少的激励，无论是鼓励还是激励，都化作了使我努力向前的动力。相对于以前的求学与耕耘，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我的绝大部分成果都产生或发表在这段时间，同时在学力上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生活上也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

今年恰逢奥运年。我对奥运会本身兴趣不大，但也略微了解奥运会所代表的原始宗教精神，相对于竞技运动的圣火，人类智慧的圣火更加重要。此宗本无争，亦无高下，但同样须有精进心，需要更高、更快、更强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因此我希望对十二年来的成果进行整理总结，不是为奥运献礼，而是让自己安心。

经过初步的归纳，我将这些年的佛教论文分为数类：一为禅，包括禅宗西土传承、曹洞宗研究、禅学与禅宗研究三部分；二为律，主要是律师与律学传承；三为天台，主要是天台宗及其支派研究；四为传统佛教的现代思考；五为中国佛教史与佛教哲学，准备陆续结集出版。

本书所收，属于最后一类。所选录的十八篇文章，大致以发表时间为序，其中大部分都发表过，《出世之教与治世之

道》，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梁译〈大乘起信论〉序考证》，载于《国学研究》第四卷(97)；《〈金刚三昧经〉作者辨》，载于《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4期；《唐代诗僧皎然的宗系和思想》，收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慈恩宗衰亡的原因探析》，载《玄奘研究——第二届铜川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玄高从学佛陀跋陀罗的一桩公案》，载于《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3期；《六家七宗与般若性空论》，载《少林文化研究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出版；《僧叡的生卒年代与思想》，收入《觉群·学术论文集》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出版；《〈涅槃无名论〉真伪辨》，载于《圆光佛学学报》2003年第7期；《弥勒形象的定型与中国人的民族性格》，载《布袋和尚与弥勒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僧叡慧叡非一人辨》，载于《正观》2003年第25期；《早期法华信仰与普贤感应》，载《普贤与中国文化》，中华书局2006年11月出版；《鱼山梵呗与早期梵呗传承的几个问题》，载《首届中国鱼山梵呗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玄奘大师早期师承略考》，曾在四川省成都市第四届国际玄奘学术会议上宣读过。《简论佛教的灵魂观》，原为《灵魂面面观》(合著)之第四章，天恩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轮回的文化渊源与精神意蕴》，原为《轮回的流转》一书的绪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佛教哲学简论》，原为《传统与超越：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合著)之一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中国佛教哲学》有一小部分载于《中国哲学教程》(合著)，高





等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11 月出版,这次做了很大的修改,补充了很多内容。

由于种种原因,上述作品在文字和内容上都有不足之处,此次我对原作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加工,使之更加完善,但主体未改,算不上脱胎换骨,只是整形修饰而已。

佛法大海,非俗人所能知;般若无底,岂陋智所能测!我与佛法大有因缘,至今一半时光游心法海,这个比例还在不断增大,所获无穷,非言可表。然而自知差距尚大,常思精进,不敢稍有懈怠。本书只是我学佛的一个初步的体会和汇报,期待诸方善知识多加赐教。如今国运昌隆,佛法大行,诸方并立,后生可畏,之所以不辞鄙陋,强作徐娘,也是希望千帆竞发,万木争春,若引玉有时,百花齐放,不负本愿。

# 目 录

总 序 .....	朗 宇(1)
自 序 .....	(1)
出世之教与治世之道 .....	(1)
——试论儒佛两家的根本分际	
梁译《大乘起信论》序考证 .....	(12)
《金刚三昧经》作者辨 .....	(26)
唐代诗僧皎然的宗系和思想 .....	(43)
慈恩宗衰亡的原因探析 .....	(61)
玄高从学佛陀跋陀罗的一桩公案 .....	(71)
六家七宗与般若性空论 .....	(96)
僧叡的生卒年代与思想 .....	(118)
《涅槃无名论》真伪辨 .....	(141)
弥勒形象的定型与中国人的民族性格 .....	(168)



僧叡慧叡非一人辨 .....	(181)
早期法华信仰与普贤感应 .....	(194)
鱼山梵呗与早期梵呗传承的几个问题 .....	(227)
玄奘大师早期师承略考 .....	(241)
简论佛教的灵魂观 .....	(257)
轮回的文化渊源与精神意蕴 .....	(270)
佛教哲学简论 .....	(277)
中国佛教哲学 .....	(302)
后 记 .....	(351)

# 出世之教与治世之道

——试论儒佛两家的根本分际

儒、释、道三家并称三教，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虽然佛教是外来的，两汉之际始传中土，但经过长期的融合与消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三教并立不仅是汉魏以来的历代国策，也是一种实在的文化现象。因此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时不能光讲儒道互补，儒道主从，儒释的对立与互补同样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能够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植根生存，并且长期繁荣发展，以致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实是不易。这一方面是由于它与中国文化有相互吻合的一面，特别是与道家思想，这一点不少学者已经论及，但另一方面，它也必有与此前的中国传统思想如儒道两家有不同的一面，不然也不会有被消化吸收的必要，这一点往往为学者所忽视。虽然党同伐异是人的本性，但人性同样有喜新厌旧的一面，如果一种外来学说与本土文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当然就不存在相互容纳的可能，不可能得以植根，反之，如果它没有任何新鲜的东西，也同样难以引起人的兴趣。初传时







的佛教一方面披着黄老的外衣，一方面散发着空灵的气息，就像一阵清新的西风一样吹遍了东土，很快就顺利地扎下根来，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佛教也尽可能地避免与儒道两家的冲突，甚至不惜改变自己的某些教义，但是随着它在中国的发展和壮大，其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和鲜明的个性的文化内核便逐渐凸显出来，特别是它的主张平等自由、强调出世独立的思想与儒家的突出社会伦理、讲究在世治世的理论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佛家强调出世，儒家强调入世，这已经成为一般学者的共识，但对其背后隐含的思想内涵则似乎较少发见，儒家也说“有道则居，无道则隐”，并不一味强调入世，佛教也谈在世而离世，不光入世，甚至还要下地狱救度众生，亦未单说出世。因此只是从现象上来看问题，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本质。

分判一种教说是出世的还是入世的，关键要看它对社会世间和人性的根本态度和观点，如果说它是采取否定的态度，就说明其为出世之教，如果是肯定的，就说明其为人世之道。佛教认为人生是苦、世间不净、人性有贪瞋痴三毒，当然是出世之教，而儒家对世间生活和人性是基本肯定的，只能是入世之道。

一般来说，以彼岸世界为终极目标的宗教都有强烈的出世色彩，佛教更是将此推至极致，它对人生世间甚至人性本身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原始佛教时期表现得更为突出，释迦牟尼最初说法，即宣示了苦、集、灭、道四圣谛，其中又以苦谛为根本。人生是苦是全部佛教的出发点，也是佛教对人生的一种根本态度。人生是苦，不是说人生之中有痛